

痛悼淘淘

入夜接连传来噩耗：淘淘走了！国失良才，我失好友，怎不让人痛之、悼之！

淘淘是一个深具远见卓识且又脚踏实地的难得的学问家，又是一个胸怀悯人悲愿力主公平正义的强烈的理想家。我和淘淘相识相交逾四十年，谁也没想到，他刚刚年逾六十就走了。

记得1971年春，我在山西原平县桃园大队知青点第一次见淘淘，即对他的胸怀大志、博学多才赞叹不已，从此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；1974年春，淘淘到河南找我，三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吃在一起、住在一起，纵论天下古今，成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；1976年“批邓”时，我们又一起被当作“小邓小平集团”挨了批；淘淘在河南农村的四年，无论到哪里都受到大家的好评。

1977年，淘淘考入北京大学；1979年底，我回到北京，最早和淘淘谈起准备组织人研究农村问题，即得到淘淘的赞同；在1980年的多次讨论中，我们形成了广泛的共识：中国必须改革；改革应从农村入手；农村问题研究应将基础研究、战略研究、应用研究相结合，实行多学科、高层次的系统研究；我们中国，西方国家模式走不了，苏联东欧模式走不通，第三世界模式不能走。怎么办？必须另辟蹊径。

“发展组”成立以后，淘淘充当着学术“灵魂”的角色；我去组建“体改所”，淘淘则一直围绕着寻找中国的“新发展方式”做文章；淘淘后来跑遍大江南北，提出的“再造中国”乃至“新能源

革命”等开拓性的前瞻性见解，不仅对中国、而且对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，都有着重大的启迪意义；可惜的是，淘淘的远见卓识并未受到急功近利者的重视，更不要说组织国力进行认真的研究了。

虽说我们分离了二十多年，但当年在农村的共同生活、在“发展组”的日日夜夜，所建立的友情却是彼此永难忘怀的。我深知淘淘追求的“理想”，在现实中不断碰壁所带来的痛苦。当我得知淘淘身患癌症后，曾与他几次通话，劝他“放下”“执着”，谁知他竟那麽在不该走的年岁就走了。

痛哉，哀哉！也许淘淘的肉身离开了这个混沌的俗世，淘淘的灵魂却仍会为中国和人类的“新发展方式”而鼓与胡！

陈一谔于美国洛杉矶

2012、3、11凌晨3时